

为何是枣强：论明代卫所、山东宗族建构与枣强移民传说的关系

赵世瑜

摘要：祖先自枣强迁来的“枣强移民传说”是山东各地比较流行的移民传说之一，以往的研究对该传说背后的移民史存在多种解释。依据现存史料，枣强向山东的移民自金元之际、元明之际到明中后期均有发生，尤与明代卫所、军人轮班戍守和京操制度，以及明中叶枣强地区的社会动荡有关。该传说大量进入墓志、碑记乃至族谱，其重要动力是明中叶以降山东宗族的建构。清代文献与口述传统中枣强迁来的时间普遍被定在洪武二年（1369）或永乐二年（1404），则是以明初北伐和“靖难之役”这两个重要事件为背景，为宗族建构提供统一的祖源标识、由此提升认同的产物。

关键词：枣强移民传说；明代卫所；山东宗族建构

DOI:10.13370/j.cnki.fs.2025.03.010

关于明初的移民史实与传说，近二十年来不断有学者关注。对各种地方史料的不断挖掘推动了移民史实研究的深入，但对如“洪洞大槐树”之类北方移民传说中迁出地或原乡认识的成因，相关研究并未得出明确结论，或认为该地“人稠地狭”，或坚持“移民中转站”的说法。^①在以往的研究中，我着重强调了移民传说的层累建构，虽从未否定过存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史实，但对为何移民迁出地或原乡会被众口一词地归结为某一地方而非其他地方，也没有给出过令自己满意的解释。

此前，我曾指出过明初的卫所军户制度与移民传说之间存在关联^②，这种关联当然不是所有明初移民问题的成因，却揭示出移民传说中的迁出地或原乡其实是卫所军人或屯户调防集结地点的可能性。以枣强（今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为迁出地或原乡的移民传说在山东各地较为流行，且这些“枣强移民传说”中，迁来山东的时间普遍为洪武二年（1369）或永乐二年（1404）。而从迁入地山东来看，将迁自枣强的移民传说定时至明初，则应是明中叶以降山东宗族建构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一、金元之际还是元明之际

围绕迁入山东的枣强移民问题，较早进行分析的是曹树基，其后用力最勤的是刘德增，二人均倾向于假设枣强是山西洪洞移民迁入山东的中转站；其后，张金奎对山东的枣强移民进行了专门的论说，认为冀州人东迁是明中后期的事情，其后裔自称明初移民并将此说法不断固化。^③这样一来，“枣

作者简介：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

① 乔新华在我的建议下就试图对“洪洞为什么脍炙人口”做出解释，上田信等人则坚持认为洪洞是“移民局”或“移民中转站”。参见乔新华：《为什么是洪洞：大槐树下的文化传统与地方认同》，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1—311页；[日]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高莹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7—118页。

② 赵世瑜：《说不尽的大槐树：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94—106页。

③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3页；刘德增：《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的移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0—116页；张金奎：《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古代文明》2011年第4期。

强”的问题便从单一的明初语境中解放了出来。

山东淄川毕氏在明万历始创修族谱,在万历十三年(1585)《初修淄川毕氏世谱遗记》中,《度支奏议》作者毕自严的父亲毕木写道:

吾祖宗以农事传家,勤笃服役,践先民迹,未纪世谱。至老父绘家堂一轴荐先,节则张之庭,为诸子指言,谓吾祖先代,当金元两朝时自枣强来,居颜神之石塘坞。始祖讳敬贤,于洪武六合初清,乐地无主之际,纵志游览,至西铺古名崔家庄者,爱其风土,画地为业,筑土为宅,北倚长白,南面豹山,东西贯淄省大路,土厚溪清,可桑可稼。念去墓远,窃徙父母骸骨,驰马北来,意必尚有兄弟在石塘者,不则何窃焉?彼人追急,至则掩之,噎西耕畴中,不卜而坟。^①

毕木自称“七世曾孙”,逆推可知其始祖从颜神镇迁至西铺的时间大致在洪武末永乐初,但金元时期迁自枣强的说法却是其父口述,并没有族谱的记载。至崇祯六年(1633)毕自严的谱序中,又称“吾宗一枝自洪武初徙益都之石塘坞”,不仅不提金元时迁自枣强,还说洪武初才迁到石塘坞,而不是洪武以后从石塘坞迁到西铺。^②清康熙间,毕自严仲子毕际有作《淄川毕氏世谱附录》说:“按,吾族之谓迁自枣强,自石塘翁至黄发翁七世矣,始纪之世谱,盖得之故老之传闻也。然又载自石塘坞迁葬之事,则确有可据。考《颜神镇志》,自唐天宝间世掌顺德夫人庙祀者四家,毕姓其一,唐碑现存。”^③

上面的记录揭示出两个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无论是毕自严还是后世子孙,都对金元时期迁自枣强的说法不敢确认,但这个说法在明代中叶山东许多地区确已普遍流行,故为毕自严祖父所采信,这让我们对金元这个时间点以及枣强这个地点对明代山东人意味着什么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毕氏子孙至少相信先祖迁自颜神镇的石塘坞,甚至可能是唐代就居住在那里的土著。石塘坞现称石炭坞,本是产煤的地方,在今博山区东南。西铺村在今淄川区王村镇,亦即蒲松龄故里,两地相距40公里左右。明初石塘翁把父母的骨骸偷盗过来安葬,到黄发翁时就已不好解释,只好推测是因为那边还有兄弟存在,后面人家追得急,只得随便埋在了一块地里。这样一个迁坟的故事,倒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新移民趁着“洪武六合初清,乐地无主之际”,开始对这个“土厚溪清,可桑可稼”的地方拓垦控产,让我们去思考明初的区域开发史。

正如张金奎所说,与其他明初移民传说有所不同的是,至少到明中叶时,山东某些地区的移民来自北直隶冀州枣强的说法就已普遍存在。著名文人李开先是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山东章丘人,他在《奉议大夫南京户部郎中贞庵刘君墓志铭》中说:

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有九。刘氏自其祖父与众同徙家于城北张林镇,在镇生子仁美。仁美生子仲英,仲英生二子,长曰时,生子浚;浚生子栾,举进士,官至运使。次曰诚,任涉县知县,诚生子澍,举乡试,任巩县知县。迄今科目相望,皆其子孙也。^④

如果我们假设这些自称枣强移民后裔的说法将迁移时代系于明初,那么距李开先生活的年代不过百余年,上引墓志铭即是李开先为刘氏移民的第七代所撰。刘氏从第五代即考中进士,其记忆内容应该不致离事实太远。

李开先文集中收所撰墓志,有多篇提及墓主为枣强移民,足以证实他所谓“章人由枣强徙居者十常有九”的说法。如《郑府右长史致仕进阶朝议大夫三溪王君合葬墓志铭》:

① 毕岱燧纂修:《淄川毕氏世谱》,清嘉庆十二年淄川毕氏刻本。

② 毕岱燧纂修:《淄川毕氏世谱》,清嘉庆十二年淄川毕氏刻本。

③ 毕岱燧纂修:《淄川毕氏世谱》,清嘉庆十二年淄川毕氏刻本。

④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七,明嘉靖刻本。

王君讳一鸣,字子默,别号三溪。长兄监生一鸛,次兄一鹤,而君居第三。取号不惟因其地,而亦随其行欤。王氏原冀州枣强县人,始祖名德,以洪武初年改迁齐东古籍坊廓三图,为盐法事编戍辽东。娶郑氏,生五子,四子俱随父,独留名谨者持其家。谨娶李氏,亦五子,名璇者娶刘氏,亦是五子,三世总十五子,出于一母,而同于五数,无乃从军,非其罪,天特以是报之耶。^①

本篇明确指出王氏先祖是在洪武初年由枣强迁来,后因“盐法事”应役于辽东。我们不是很清楚王德落籍后是否本为军户,因事金赴辽东应役,还是他原为民户,后因事充军辽东。但从李开先颇带戏谑的口吻,说王家三代人都有五个儿子,暗合明代军制(五军都督府、五千户所为一卫)来看,他似乎是在暗示王德为原籍军户。

李开先文集中所收记墓主先祖迁自枣强的14篇墓志、传记和迁茔记中,称金末因河患迁入章丘的4例,元末避乱迁徙的2例,洪武初迁来的1例,推算在永乐时迁来的1例,未记迁徙时代的6例。就此而言,张金奎关于金元之际有不少冀州民迁往山东的说法确乎有据。不过,能够请李开先撰写墓志、传记的人一般都是士大夫,这种情况是否普遍,还无法遽作定论。

此外,墓志作者所述墓主家世生平,一般都依据墓主家人弟子提供的行状,或者根据墓主生前所述,如《通奉大夫云南右布政使脉泉李公合葬墓志铭》云“脉泉李公未卒之前日,遗书与予属后事,而托墓文为尤恳。未葬之前月,子美中持自所为状请墓文,而其辞为尤哀。既而得其门客王永寿状,而其事为尤详”^②;又如,《张氏迁茔记》云“邑人张悔庵乃先君密交,后又忘年与予为会。长素亦喜读阴阳书,但不失之酷信耳。尝拉一二知友,披阅家乘,指点祖阡,勒状请予记其新迁茔,于是据其手状并其口述而为之记”^③。所据行状、口述是否准确,亦不得而知。

在后世族谱中,常常有这样的表述:

闻之尊人云,吾族本出直隶省真定府枣强县师友村。自洪武二年迁于益都城北镇青门外马驿店庄,遂著籍焉。实因益都遭元末花将军之乱,户口流亡,居民鲜少。洎明太祖定鼎后,诏令他郡之民,许其出一支迁徙是县,此吾族之来所由也。但世远年深,宗牒散失。又闻之尊人云,吾李氏家谱归藏棣中,忽于乾隆三十余年间被穿窬连棣盗去。遂于始祖之讳号与同宗之支派益不可考矣。^④

将元末动乱和洪武迁民这两个时间点系在一事,或分系为两事,在不同文本中都有存在,我们姑且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但如果与金元之际的时间点相参照,我们或可将元末与明初视为同一个时间点。如此,则李开先所撰墓铭纪传中明确标注迁入时间元末明初的应为3篇。

《通奉大夫云南右布政使脉泉李公合葬墓志铭》中,虽未明言时间,但李开先记述说:

李公讳冕,字端甫,世居明水镇百脉泉,因号脉泉,人无远近大小,咸称曰脉泉先生云。章人自枣强徙者,十居八九。祖成聚生志,志生梅,梅生秀,秀则公之父也。生为善士,歿赠员外郎,志犹枣强,梅以下盖三世为章丘人矣。母太宜人康氏,以弘治庚戌八月十六日生公于镇之南隅,卒于嘉靖癸亥正月三日。^⑤

据此可知,墓主李冕是枣强迁章丘的第五代,始迁祖李成聚及其子李志皆生于枣强,从第三世李梅即

①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八,明嘉靖刻本。

②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七,明嘉靖刻本。

③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一一,明嘉靖刻本。

④ 《青州益都西店渔古堂李氏家谱序》,族谱录网,https://wiki.zupulu.com/topic.php?action=resumesview&topicid=1010,发布时间:2008年9月19日;浏览时间:2025年2月17日。

⑤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七,明嘉靖刻本。

墓主之祖父开始生于章丘,则其迁至章丘的时间,应向上推算百年,大约是永乐时期。至此,李开先所撰14篇墓铭纪传中,金末元初与元末明初的枣强移民各有4篇,可见姑以此类资料论,尚不能轻易否定明初枣强移民之事的存在。

本文对金元之际枣强移民至山东的说法暂不讨论,因为这涉及金元时期的山东地位等重要问题,比较复杂。而自清代至今,在祖先迁来时间的问题上,洪武、永乐两说几乎彻底淹没了金元之际说。究其原因,简单说,就是那些率先入籍、考取功名、建构宗族的人,是从明代国家那里获得相应社会地位及身份的。

二、洪武二年抑或永乐二年:如何看待族谱记录

如果说,在明人的文集、墓志甚至族谱中见到的关于枣强移民迁来时间的说法还比较多元,有金代说、元末说、洪武说、永乐说等诸种,那么到了清代的族谱文献中,包括认为祖先是明初卫所军人在内的洪武说、永乐说等明初迁来说,就已经成为主流观点了。

在明人文集、墓志和明代创修的族谱中记载迁自枣强的,毕竟多为少数上层士绅,我们自然不能仅凭百十个此类例证来推定多数移民的情况。但清代以来大量的族谱文献和口述资料,在资料性质、记载内容和所涉阶层等方面,都与明代文献有很大不同,我们有必要对这些文本做出说明。

首先,不能将清代族谱中称祖先为明代军户的说法尽视为子虚乌有。就像许多族谱在讲述始祖落籍或注籍某县某里某甲一样,在后代编制族谱的时候,除了墓碑以外,纳税和服役的资料最容易成为建构祖先系谱的依据,一是因为这些户籍资料是最需要保存的,二是因为这些资料中记录有户名、住址和土地方位。尤其是军户中的军官因为世袭要呈写承袭供状,其中姓名、继承关系和履历都会一一交代明白,对后世而言就是关于明代祖先的重要记录,一些族谱甚至把这些承袭供状直接抄入作为该族谱的明代部分。所以相对而言,称祖先为军户的族谱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当然,并非很多族谱都能清晰地留下祖先的军户经历。比如,民国章丘《谢氏支谱》中所收最早的谱序写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即其初修时,仅述及“始祖于明初自枣强徙居章丘”;嘉庆十四年(1809)的谱序中进一步记“谢氏自明以前居直隶之枣强,洪武二年徙章邑”,明确了迁徙的确切年代;到民国序中则称“我谢氏原籍直隶真定府枣强县,肇自明初奉宪徙居章丘城里隅首东路”,将迁徙原因确定为奉官府的命令,也有了迁居的具体地点。这种时间越晚近记载反而越精确的现象,一般来说应系人云亦云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为了强调落籍依据。

不过,在该谱世系表始祖谢成之下有两段小注:

明初徙章丘,相传在洪武二年,始祖以上世系莫考。胞弟侗、华家庄侄宗周尝亲诣枣强访之,迄无端绪。惟隆磐公所遗印章,题曰“吴下诗礼人家”,当时必有所据。但世代绵远,此外更无确证,不敢妄附,统俟再详。佺谨识。

吾家族谱考系,始祖以上已经先高伯祖为东公躬诣枣强,访葺载在。今又百余年矣,更□确证,谨依前谱续葺,余外弗敢妄附。芳纶谨识。^①

文中提及的隆磐公,名九式,字隆磐,为第七世,距明初近200年,估计是嘉靖时人,留下的印章文字说明其祖上应该是江南人,所以在乾嘉时期续修和民国时三修族谱时,族中都有人前往枣强核实,却都没有头绪。这说明谢氏族中在明代恐未必有称祖先来自枣强的说法,甚至直到民国时谢氏族人仍

^① 《山东章丘谢氏支谱》卷一《世系》,巴蜀谢氏文化研究中心编:《谢氏族谱》,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特藏民国刻本。该刻本只保存有谱序、卷一、卷七、卷八的部分内容。

对此说法心存疑问。总之,从清代以来章丘谢氏的明初祖先叙事来看,我们并不能排除谢氏祖先从江南先到河北、再到山东的可能性。

淄川王氏自明中叶起成为官宦人家,第七世出了明清之际的著名人物王鏊永。淄川《王氏世谱》的叙事比较详细,可以与上谱进行对比。其康熙二十一年(1682)序《续修世谱引》中写道:

粤我王氏之先出自冀州枣强,明兴洪武初年,会有迁发之令,始祖讳贵,自枣强迁淄,占籍于澧泉乡杨家庄居焉,即今之鸾桥也。相传,其时三户垛积一军勤王,然二户无传,而我王氏至四世少祖讳珍者,始以南京门军明注于谱,四世上无军户可考,源流莫得而稽矣。此我王氏始占淄籍所由来也。

……族旧有世系图一幅,仅列名讳,八世而上略备焉,八世而下未悉也。族之贤者间或手录成帙,以备稽考。甲申后变乱迭遭,原图既失,仅存手录一简。岁甲辰,穆弟银台以内艰予告归葬,爰取存谱而授之梓,或以隶籍丰沛,桑梓日远,恐历世久而湮没无考,故梓之以志不忘。

……或曰六世仲贤祖以养子为后,宜从删正,第载在原谱,故仍旧贯。若夫女户彦岗冒姓五世,至钺始复杜姓,旧谱未录,恐涉庞杂,则亦不载也。^①

这篇谱序写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虽说此谱为“续修”,但当时仅有第八世即明中叶时编成的世系图抄本留存,因此该谱序中说到的祖先事迹应该来自这份世系图上的简略记述。其中虽提到始祖来自枣强,但只一带而过;同时提及四世王珍在南京为军,据此可推测其是明初垛集的军户。后面又提到五世的女户和六世的养子,可能都与军户承役有关,只是清代人已不明其意。

此外,文中的“隶籍丰沛”有虚指、实指之别,虚指是因汉高祖刘邦起于丰沛,故可引申为帝王故乡,实指是随朱元璋起兵的大量兵源的确来自淮北地区。无论何指,“隶籍丰沛”都很可能是在表示祖先为南直隶的原籍军户。至于王氏祖先是来自南京迁往枣强而后再迁淄川,还是从枣强赴南京应役再迁至淄川则不得而知,总归是作为军户在江南、河北和山东间流转,最终落籍于山东。这与章丘谢氏族谱中留下的迁移轨迹类似。此外,两份族谱关于祖先在江南经历的记述,都是由生活在明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的人所留,这大概也不是偶然,既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这一时期迁往山东、因落籍留下相关说法,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此时逃离军籍而转为民籍。

参考明初历史可知,明初北伐时有大量军人是江南的原籍军户,继续征伐西北、西南地区的军人亦是如此,这些人后来有相当部分留驻在北京、河北的各个卫所中,明代留存下来的《武职选簿》可以为证。而后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又率北京的军队南下,在河北、山东境内打过几场大仗,因此北方军人留有从军江南的记忆不难理解。由此观之,关于洪武初年或永乐初年的时间坐标,应该是涉及皇权更迭的上述两大军事行动的从征军人留给后人的,只不过这些记忆大多为口耳相传,到明中叶便已语焉不详了。

其次,明代率先建构宗族的往往是上层士绅,他们后来常有联宗行为,这样关于祖先来历的说法就会被后来联宗的那些支族所接受并写进他们的族谱里,其传播面也就越来越广。如前述毕自严的家族,康熙时毕际有写道:

当万历、启、禎间,先少保公翱翔仕路,中丞、主政两公翩跹继起,凡遇同宗,无不加意敦笃,与徽州尤往来无间。及老成凋谢,渐阻音闻,往年茱萸一枝,平居则庆吊相通,有事则危难相倚,近迹亦少疏矣。惟新城、益都,日益加暱,则以相去近也。他则近亦隔郡县,远或越数省,有恐久而无可考镜也。故于曾经通谱者,略举其各枝之一二人,附录于左,冀异日子孙,知凡我同姓,原出

^① 淄川大鸾桥《王氏世谱》续修委员会:《王氏世谱》(第11次续修),内部资料,2001年,第7—8页。

于一人所分,即邂逅相逢,一询家世,即知行辈所在,称呼可以不紊,一见如故,联久而弥亲也。^①后面提到的毕氏,包括莱芜毕如松、徽州毕懋良、贵溪毕三才、光山毕佐周、历城毕嗣周、莱州卫毕拱辰、颜神镇毕升高、蕲水毕十臣、文登毕靖之、高平毕振姬、新城毕秀、平阴毕良圻、益都毕忠吉、辽东毕典霖、乐安毕周桢、巨野毕宗闻、灵山卫毕振等家族,大都是明万历以后的士大夫,其中还包括两三个军户家族^②,应与毕自严家族并无直接的关系。

淄川王氏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后又不断重修族谱,但在此后的谱序中,不再提及祖先来历的问题,而皆重点强调不断续修族谱的目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重续世谱小序》说:

人繁世久,势不能同井而居、安土而不迁也,则寓居他乡、寄籍异地,一再传后,使执旧谱以求之,问其出自何支,传自某世,皆茫乎莫对也,不几于一本而途人矣乎!于此而欲联一家之心,使之勿忽忘也,庸有他术哉!仅惟取谱而续葺增修之之为要耳。^③

虽然知道祖先来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后世子孙分散于各地、历时久远,形同路人,需要把他们“联”在一起,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修葺族谱。换个角度理解,就是通过编族谱把已经不知道(或其实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群“联”在一起,形成一个不断增大的关系网络,这就是人们熟知的联宗。前面所引清代淄川的《毕氏世谱》和《王氏世谱》,就是两部联宗谱。

这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是甘肃永靖孔氏。根据他们在《重印〈孔子世家谱岭南派〉序言》中所写,他们是南宋末第五十二代中岭南派嘉兴公的后裔,孔嘉兴携子、侄从广东惠州迁居甘肃皋兰,到第五十八代有一支从皋兰颜家湾迁至半个川(今永靖太极镇大川村)。1943年,该村族老孔庆惠前往曲阜领取孔氏总谱,孔德成封该村大成殿为“西北孔子大成总殿”。^④书中还收有孔德成所写赠“侨丞宗长惠存”诗,诗中亦有“谱牒领将”句,说明曲阜孔氏对该支孔氏的认可。《孔子世家谱》成书于1937年,由孔德成总裁,永靖孔氏有可能是在闻说此事后前往曲阜联宗领谱的。

不过,在永靖太极镇四沟村,有座青马都司老祖殿,殿前悬挂一口铁钟,钟上镌刻了一段《家谱序文》:

公元二〇〇四岁在甲申,戊午壬午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谱序文

兹明朝从兰迁居大川,始祖公佑生子四,崢、魁、斌、嵘,大沟支系彦嵘公苗裔。马氏回族生三子,原住大川庙低(应为“底”之误——引者)下,清初迁湾达,遇洪灾,家谱失传,迁峡大细三沟。同治发生民族矛盾,三房随回住大川。变乱太平后,公迁后坪,多种原因造成从承至继十代谱序不详,无名考证。为续脉源流,千秋永祭,子孙发达,圣祖至德,嵘公、太母三代归神道,青马都司老祖、黑、白马老祖,与(应为“于”之误——引者)成化某年建庙供奉。后裔诚念,铸钟一口,千秋铭存,叩献都司殿。甘肃永靖太极镇四沟村。

在这段《家谱序文》中,这些孔姓后裔称其始祖佑有四子,本支为第四子嵘公的后代;大约在明中叶,嵘公三子均被奉为神灵,其中第三子后裔又为回族,可见所述内容颇为混乱。

2019年于庙中所立《重修青马都司老祖殿碑记》称:

太极镇四沟村,青马都司老祖爷,明朝成化年间据传地府东门守将、先锋,私自下界转世一

① 毕岱燧纂修:《淄川毕氏世谱》,清嘉庆十二年淄川毕氏刻本。

② 毕岱燧纂修:《淄川毕氏世谱》,清嘉庆十二年淄川毕氏刻本。

③ 淄川大鸾桥《王氏世谱》续修委员会:《王氏世谱》(第11次续修),内部资料,2001年,第12页。

④ 孔德成总裁:民国《孔子世家谱》首卷,1937年铅印、1997年重印本。

家,原址大川房神九天圣母之点化,青马都司、白马先锋、黑马先锋,封授人间之香火,后裔供奉。裔传祖业,占据山庄,人丁兴旺,分为三支,孟房居峡子沟,仲房居大沟、西沟,季房居后坪(现居新寺乡,回族)。三位老祖长房家供奉,历经岁月,世辈之别,于清光绪末年青马老祖神祇,从长房家接之西沟,二房家供奉。

在当地孔氏的祖先记忆里,二世嶧公的三个儿子实际上是地府的三位冥神转世,后裔三支分别居住在四个地方,青马都司老祖殿既是供奉神灵的庙宇,也是他们家族的祠堂。这样的传说和殿中供奉的祖先像都深受藏族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第三子后裔为回族的说法,又是明中叶以降汉回交融的体现。总之,他们的祖先记忆并无作为孔子后裔的内容,反而更多地体现了明清时期本地汉、番、回杂处的历史情境。前者应该是近代以后族内知识精英的文化创造,民国时与曲阜孔氏的联宗行为则是此种创造的产物。

此外,与联宗行为性质接近的,还有偷窃族谱。前引青州李氏族谱说:“又闻之尊人云,吾李氏族谱归藏棧中,忽于乾隆三十余年被穿窬连棧盗去。”^①无独有偶,据当地人回忆,枣强寺上村有护国寺,其功德主为张氏,每逢年节会将族谱供奉在寺中,后被寺中僧人将族谱偷走。^②这种偷盗族谱的行为,如果不是后世为此前族中并无族谱所制造的借口,就只能理解为无法追溯祖先来历、借他人族谱为本家族谱成为当时需求的结果,而这也会使某种祖先来历的说法得到进一步传播。

历史上,大规模的移民并不多见,多见的往往是不同时间的小规模人口迁移,只不过在王朝更迭时期的大规模移民浪潮更容易被文献记录强调而已。同样,虽然祖先来历传说多见于族谱,但最初能够编纂族谱并通过刻印族谱使其广泛传播的,也多有经济、文化实力的少数家族。后来许多通过联宗进入族谱的小家族,以及更多无力编纂族谱的家族和家庭,往往没有祖先来历的记忆,只能被动地接受掌握话语权者的说法。因此,类似洪武二年(1369)和永乐二年(1404)这样的时间标记,往往是那些具有早期祖先记录(如军户的承袭供状或户帖等入籍记录)的人留给世人的。

三、回望枣强

枣强移民传说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作为移民迁出地或原乡的枣强当地保留了一些有趣的证据。其他类似移民传说中的迁出地,比如洪洞、苏州阊门、麻城、南雄等地区,都还未发现能够佐证其为迁出地的具有说服力的材料。

前引青州益都清代李氏族谱序中说:“闻之尊人云,吾族本出直隶省真定府枣强县师友村。自洪武二年迁于益都城北镇青门外马驿店庄,遂著籍焉。”^③又有新撰《重修临淄李氏族谱碑记》称:“宋靖康二年(1127),金兵南侵。裕公七世孙峯之、崑之、崑之迁直隶枣强县城南,勒刻石牛,立村师友庄。繁衍十代,为李氏枣强之大族。明洪武二年(1369),吾开基始祖复立公兄弟奉旨军迁,长讳复吉迁安丘夏坡,次讳复立,胥宇于临淄城西南单家庄,三讳复呈迁诸城又复迁青州城北,四讳复祥迁居潍县。”^④可见山东多地李氏族人有关祖先来自枣强师友村(庄)的说法。师友村今为枣强王钧乡大师友

① 《青州益都西店渔古堂李氏家谱序》,族谱网, <https://wiki.zupulu.com/topic.php?action=resumeview&topicid=1010>, 发布时间:2008年9月19日;浏览时间:2025年2月17日。

② 傅宝臣:《寺上护国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枣强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枣强县文史资料》第9辑—第10辑,内部资料,2000年,第381页。

③ 《青州益都西店渔古堂李氏家谱序》,族谱网, <https://wiki.zupulu.com/topic.php?action=resumeview&topicid=1010>, 发布时间:2008年9月19日;浏览时间:2025年2月17日。

④ 《重修临淄李氏族谱碑记》,中国台湾网, https://www.chinataiwan.cn/zppd/PXYW/201003/t20100310_1278968.htm, 发布时间:2010年3月10日;浏览时间:2025年2月17日。

村,明代枣强的一篇墓志记述:

不佞宰治枣邑,与省吾公相知最久。不佞乘驄京都,省吾公一旦捐馆,伯子维聪征墓碑记于不佞,不佞虽固陋,敢辞弗文。按公讳遂,字禹疏,别号省吾,世为枣强边村人。始祖以洪武二年应募,亲冒矢石,立功疆场。明太祖御命曰麓喇李。高祖进忠,进忠生文道,乃由边村徙居倘村。文道生晨,由倘村徙居师友村。晨生克功,是为公父,以公显贵,赠文林郎南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母马氏赠孺人……公生于嘉靖乙卯年五月初四日,卒于天启癸亥年正月廿九日,得寿六十九岁。生男二,长维聪,廩生;次维纂,增广生;孙男四,长应祥,例监;次兆祥,南阳府经历;次胤昌,廩生;次履祥,进士,例得并书。^①

这篇墓志的作者毛尚忠,嘉善人,万历甲辰进士,曾任枣强知县,官至都察院监察御史。据墓志所记,墓主祖父李晨迁居至师友村,与前举益都李氏族谱所记一致。我们不知道这是益都李氏在清代编纂族谱时到枣强去寻根联宗的结果,还是枣强李氏确有一支从枣强迁至益都。根据墓志,墓主始祖为卫所军户,被朱元璋赐名“麓喇李”,麓喇即粗拉、毛躁之意。其“世为枣强边村人”,故应为枣强的原籍军户。我们并不清楚,墓主的始祖“麓喇李”从军之后,除了在枣强原籍的军户子孙外,其他子孙在何处应役;相应地,我们也就不能排除李氏原籍军户的子孙有到山东应役的可能性。同理,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李晨才迁到枣强师友村,不太可能在洪武二年(1369)就已迁至山东益都,除非那是枣强李氏的另一支。

更值得关注的一篇碑记是济南人李攀龙所撰的《枣强县刘村新建三官庙记》:

刘君雅,枣强刘村人。村东南去邑三十五里,称刘村,以族姓焉。村东南五里龙泉寺,刘东父某所建也。刘君可建,其比则某祠,又北则某祠,又西北则某祠。刘君尝游于田矣,即民间疾苦,察眉而药饵起之,葬者匍匐衾绌,婚者拮据羔雁也。夏月孔暍,行者道暍,河朔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场圃,以荫息其木下。壶浆饿莩,厨传过使,转相诵慕,视庐舍如归矣。以社以方,谷臧农庆,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御菑患,载在秩典,岁时伏腊,我乃于三数祠集飧鬯艾,作敏主伯,以辑乡井,以联宗党,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祸,岂为淫祀哉!枣强当燕赵之郊,诸郡之卒戍徒役交杂于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即加饥馑,必多暴子弟,何可无寔烈之风也。同舟而济江海者,覆于其各有一壶之心,何者?失众之形也。刘君为一闾右家,令诸郡卒徒视庐舍如归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何可后事而备乎?是庙也,刘君有以处其中也,有处其中,则栖托之迹重,而流移逋逃欲为不逞者,沮于嫌忌之势矣。^②

李攀龙与李开先是同时代人,“后七子”之一,官至河南按察使。张金奎也提到他写的墓志中有许多例子是讲明初迁自枣强的,这篇碑记表明李攀龙确实很关注枣强,而且不只是在山东本地为枣强后裔写墓志。

李攀龙的这篇碑记应该是他在嘉靖中叶任顺德知府时所写,因为顺德府与冀州相邻。同理可知,碑记虽未注明时间,但这个三官庙应是嘉靖中叶新建。不过,这篇碑记并没有谈及三官庙,而是先提到了“刘东父某”建的龙泉寺,又提到刘雅在村北建的三个庙。今天的刘村已分为东刘、西刘、北刘和前刘四个行政村,在前刘有块半埋于地下的大碑,露出地面的部分文字漫漶,但仍可识读为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重修龙泉寺记》,碑文中有“龙泉寺旧矣”“元至正”等字样,证明李攀龙碑记中

① 《御史前邑侯毛尚忠撰兵李公暨配危孺人墓碑记》,万历《枣强县志》卷三《丘墓》,清康熙刻本。

② 李攀龙:《沧溟集》卷一九《记》,明万历三十四年陈升刻本。张金奎在文章中也注意到了这篇碑记,但没有将其与班军人卫等频繁调动联系起来,参见张金奎:《明代山东地区枣强裔移民考》,《古代文明》2011年第4期。

提到的龙泉寺就在这里,据此可知碑记中其他内容当亦为实录。现碑旁有一新建的一米多高的小庙,庙中并排三个神龛,龛中各有一香炉,无文字和神像,疑为今人因有三官庙的记忆而重建。^①

虽然李攀龙未指出刘雅所建为何庙,但碑记中的“以社以方,谷臧农庆,告成地利,介言景福,捍御菑患,载在秩典,岁时伏腊,我乃于三数祠集殄髦艾,作敏主伯,以辑乡井,以联宗党,以固守望之好”等语,说明它们是被视为社庙的。重要的是,这些庙的作用是使“河朔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场圃,以荫息其木下。壶浆饿莩,厨传过使,转相诵慕,视庐舍如归矣”,即河北各地的“卒戍徒役,瓜期往代”,人们可以在经过这里的时候休息一下,这使得他们广泛传诵,都将这里视为自己的家乡。这样一种表达,与后世都称自己祖先迁自枣强的心理是非常一致的。“瓜期”通常指公差的任期,所以这些“卒戍徒役”极有可能是指轮班换防的卫所军人,这与我以前的假设吻合,我们甚至可以推想洪洞传说中的重要标识广济寺也是同样性质的所在。

当然,这篇碑记中透露出的信息还不止于此。“枣强当燕赵之郊,诸郡之卒戍徒役交杂于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即加饥谨,必多暴子弟,何可无寔烈之风也”,说枣强的位置特别,是因为处在河北(包括京师)交通的要冲,所以各地调防服役的军人都要经过这里,本来就是“慷慨悲歌之士”,再饥寒交迫,便会铤而走险。刘家只是一个本地大户,但他“令诸郡卒徒视庐舍如归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他对这些军人很好,所以哪怕是其他的流亡人口,也不会起来造反。文末说“是庙也,刘君有以处其中也;有处其中,则栖托之迹重,而流移逋逃欲为不逞者,沮于嫌忌之势矣”,这个“有处其中”和“栖托之迹”究竟何指,不得而知,有可能是指刘雅本人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分子,并且具有某种权威性,使“流移逋逃”者不敢为非作歹。

关于明代军兵定期轮班戍守的研究,以彭勇的著作《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最为全面翔实。据书中成果可知,京操班军本就牵扯到北直隶和山东的卫所,而永乐十三年(1415)对全国多地军队的检阅活动中,两个重要的操练地点一个是真定,另一个是德州,都在枣强附近,甚至枣强在明代就隶属于真定府的冀州。由于地处腹里,山东都司所属的绝大多数卫所都始终参与京操,包括位于枣强移民传说流传最广地区的济南卫、青州左卫等;而北直隶后军都督府所辖近30个卫所参与京操,包括与枣强有关的真定卫、神武卫等。^②在乾隆《枣强县志》中,记载了康熙时将明代卫所屯地归并至州县的数量,其中就包括腾骧右卫、真定卫、神武卫的屯田约200顷,约占当时在册土地的十分之一。^③在万历《枣强县志》中,还记载了万历初年土地清丈后清出留守后卫的屯田约20顷^④,这说明到清初裁卫并县的时候,所遗卫所屯田的数量与明前期已有较大差距。这些记载都表明,在枣强县所在的真定、冀州地区,明代曾存在较大数量的原籍军户和在卫军户。据估算,永乐年间在整个河北地区设有80多个卫、30个左右的千户所,约计50万人,占当时顺天八府总人口的60%。^⑤这样一来,无论是轮番京操、自然迁徙还是逃亡,军户人口在明代河北地区的人口流动中必然占有相当的比例。

李攀龙任顺德知府时,恰在“庚戌之变”发生后不久,正是“北虏南倭”问题最为严重的时期,军队的调防也因此特别频繁。彭勇已经指出,此后除军兵入卫之外,国家还开始征调民兵分班入卫,并且脱班、逃班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班军在上、下班途中扰民的事件也经常出现,故真定一带有“操军

① 我在2024年12月前往枣强前刘村调查时,在村中路遇一位老人,向他询问村中是否有三官庙,他就把我们带到了碑旁小庙处。

② 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173、188页。

③ 乾隆《枣强县志》卷三《赋役志·地征》,清乾隆十七年刻本。

④ 万历《枣强县志》卷二《田赋》,清康熙刻本。

⑤ 梁勇:《浅论明代河北的卫所和军屯》,《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过,篱暂破”的谚语。^①这极符合碑记中所说“卒戍徒役,瓜期往代”,以及“即加饥谨,必多暴子弟”“流移逋逃欲为不逞”等描述。李攀龙这些模糊的说法,指的应该正是嘉靖中期以后出现在枣强一带因班军轮操造成的社会乱象。

作为被钱谦益称为“操海内文柄垂二十年”的大文学家,李攀龙“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②。他因何缘由为枣强一个普通富家翁建立的寺庙撰写碑记,颇有蹊跷。是不是恰恰因为他知道山东人多以枣强为原乡,又听说了这样一个“转相诵慕”、脍炙人口的说法,即当地有这样一个三官庙,给来往的军人宾至如归的感受,于是通过撰写碑记的方式对枣强移民传说进行解释呢?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这篇碑记,我们就无从知道,明代中叶在军人的口中曾有过这样一个广泛流传的有关枣强的认同传说。

当然,枣强成为一个移民的迁出地,并非只有单一原因。比如,嘉靖“二十四年夏五月大旱,百姓流移;三十五年秋八月,大雨水伤禾稼;三十九年大饥,民流移过半”^③,说明自然灾害导致大量人口逃荒。方志中虽然没有明确灾民逃往何处,但山东离枣强不远,自然会成为主要的求生地之一。前举张金奎关于冀州向外移民主要是在明中后期的说法,也与这个时间点相合。

除自然灾害外,官府赋役的加重也是百姓流亡的重要因素。“洪武年间有任民开垦、永不起科之命,后地尽辟,方每顷税粮二斗八升为例。是时,简用舒,贡赋薄,而民易供。嘉靖初年,差徭日烦,征粮养马,有三十亩折一亩者,有十亩折一亩者。”^④方志中特别强调了嘉靖初年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当时的马政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

至万历时,枣强一带社会动荡加剧。万历四十三年(1615),“七月不雨,殍相望于涂。盗贼蜂起,白昼抢夺,城门长闭,商货不行,士民错愕,不知所止”^⑤。方志记载当时地方官的德政,都是他们如何安抚流民,如知县南宪仲,“地亩清出者三百余顷,荒芜之地,督民开种免租,且给其费,垦田几二千亩,招抚流移复业者四百余家”^⑥;又如知县魏廷相,“枣频年苦旱,室空烟冷,不知几为沟中瘠。公下赋薄徭宽之令,广为招抚。一时流移群集,处处闻鸿雁歌”^⑦。这些虽然可能都是对地方官的溢美之词,却也说明当时枣强存在大量流民的情况属实。

无论是军户还是民户,自明中叶起都大量脱籍逃亡,其后世子孙往往难以记录其迁徙的具体时间。他们多隐匿其为某处逃户的身份,往往会以明初奉诏迁移为借口获得在迁入地定居的合法性。因此,以洪武二年(1369)或永乐二年(1404)作为入籍的时间标记,也就成为明中后期逃亡人口常用的格套。

四、传说的意义:墓碑、族谱与宗族

综上所述,相比后世众口一词的洪武初年或永乐初年这两个移民迁徙的时间点,就枣强移民而言,嘉靖以后这个时间点似乎更于史有据。一方面,在所写墓志中强调墓主祖先来自枣强的山东籍士大夫多是嘉靖前后时期之人;另一方面,枣强及周边地区在嘉靖前后时期的确出现了较为剧烈的社会动荡和人口流动。这二者之间看似并无逻辑联系,毕竟前者记录的是金元时期或元明之际迁至

① 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以京操班军为中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7、260、266页。

②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28页;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七,中华书局,1974年,第7377页。

③ 万历《枣强县志》卷三五《灾祥》,清康熙刻本。

④ 万历《枣强县志》卷二《田赋》,清康熙刻本。

⑤ 万历《枣强县志》卷二《知县·附德政去思碑记》,清康熙刻本。

⑥ 万历《枣强县志》卷三《祠祀》,清康熙刻本。

⑦ 万历《枣强县志》卷三《祠祀》,清康熙刻本。

山东之事,而后者是明中叶以后人口流散的背景。不过,为什么不少祖先在不同时期迁至山东的人到明中叶时才请人撰写墓志、墓碑呢?

前曾提及,李开先曾为章丘人张悔庵写过一篇《张氏迁茔记》,他根据后者提供的行状记叙,张氏祖先在金末从枣强迁到济南东北的老僧口,那里还保留着老坟地,旁边还有元代一个御史的碑,文字已全部磨灭;第六世时再迁章丘城的东街,到张悔庵是第十一世。因他这一支都是次子,坟地已不够用,只好越迁越远。张悔庵“素亦喜读阴阳书……尝拉一二知友披阅家乘,指点祖阡”,自己在“去城十余里”的芦山之阳找到一块风水很好的坟地,在嘉靖十八年(1539)将父母的坟迁至此处。因为害怕像元朝御史碑那样完全磨灭、不识姓氏,便请李开先写记。对此,李开先感慨道:

嘉靖改元,陈静斋巡抚山东,每一里社立石刻乡约,族有不识字者磨而用之。予时方幼,不曾读其文,止闻之长老云云,徒以为恨。有言墓中志铭可考者,无从出之,向为大父作表,亦只据碑刻之见在者耳。以此观之,悔庵之亟亟记其迁葬,真为我灵宝许文简公在他处掘土得其上世事、武官秩宜,其剧喜大惊,刻书传之远迹也。^①

此处所说嘉靖初各地里社立石,指的是当时各地重申洪武礼制,各里及卫所均立里社之碑,并确立乡约之制,我曾在《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一书中对此有所论及。^②但里社之碑在许多地方形同虚设,如李开先的族人即将其文字磨掉,另做他用,很有可能就用来刻写墓碑。灵宝许文简公,即河南灵宝许瓚,嘉靖初为文渊阁大学士,其父许进及两兄弟均曾官至尚书。李开先所说未见他处记载,似乎是说许瓚在某处挖到一块墓碑,才知道自己祖先家世,异常兴奋,立即刻书传播。这说明到明代中叶就连这样的高官显贵都不知道自己家世,也说明他们身居高位之后,有了追述其祖先世系的迫切愿望。

在这篇迁坟记录的最后,李开先记录了他与张悔庵的一段对话:

悔庵又尝谓予曰:古虽不祭墓,吾欲祭祖于冬至,祭父于立春,朱子曾以为不可,今惟窃取程子之意,于礼则何如?予曰:义也。义者,礼之实。协诸义而协者也,礼固未之前闻,然可以义起也。先王之祭川,必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所以教民反始也,每茔虽春秋并祭之可也。^③

张悔庵想把祭祖和祭父分开,意即将尊奉大宗和尊奉小宗分开,问这是否符合礼制。李开先回答说,礼的实质是义,即所谓礼以义起。由此可知,许多人因为现实生活的需要,要“另立门户”,但和旧的礼制规定不符,于是“礼以义起”这个说法就赋予了这个变通的做法合法性。

郑振满在20多年前就曾对此解释说:“明清士大夫最流行的口号叫‘礼以义起’,也就是说只要符合正义,你就可以自己创造礼制。”^④几年后他又进一步解释说,所谓“宗族庶民化”,其“背后的道理,是‘礼以义起’,就是说‘礼’是根据‘义’来的;而‘义’是实践,所谓‘义者,宜也’……根据实践的发展,来创造意义”^⑤,而如果不能知道各个地区何时突破了大宗与小宗的界限,就不能认定宗族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从山东的情况看,明嘉靖年间这个界限被突破,宗族开始在一些地区建构起来。山东的宗族在“庶民化”之后的发展路径与闽粤等地不同,但未必在开始时的动力就不同。

①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一一,明嘉靖刻本。

② 赵世瑜:《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16页。

③ 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一一,明嘉靖刻本。

④ 郑振满:《从民俗研究历史——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编:《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第332页。

⑤ 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郑振满教授访谈》,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68—491页。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社会上开始重视墓碑和墓志,并注意要写明祖先的来历,这正是后来的族谱编修的基础。同时,这个时候又有大量人口涌入山东,为“敬宗收族”提供了好机会。前面提到的一些族谱多是在清代编成的,那些家族往往在明代中叶就有了科举功名上的成功人士,只是到了明清之际才开始编修族谱。谱序中的说法总是以人口日益繁衍为修谱目的,但我们也可以将此理解为,“收族”不仅意味着人口数量的“繁衍”,同时也代表着家族人口“增多”所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逐渐将关于祖先来历的说法统一为一种,也就是确立“一本”或“同源”的标识。尽管清代的族谱中不乏对祖先来自枣强这一说法的怀疑,但终究都将其写入族谱。祖先于洪武二年(1369)或永乐二年(1404)、而非金元之际迁自枣强的说法,也终于在清代成为山东一些地区人们的共识。

五、结 语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以上讨论的是山东的一个移民传说,所谓传说,就是无法确认其内容真实性的事情,其背景的部分往往是真实的,只是在事情的起因、过程等细节上有比重不等的虚构成分。它们既可通过口头形式,也可通过文字形式传播,最后往往是通过文字形式流传下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献中保存了许多传说,而不可说传说只是来源于口述传统。今天我们知道枣强移民传说,大多不是口述的,而是从以族谱为主的文献中看到的。在族谱中,枣强移民传说又大多被简化为关于始祖来历的一句话,那些细节上的虚构内容,比如类似南雄珠玑巷传说中的苏妃故事、赵曷故事,洪洞大槐树传说中的打锅牛故事、胡大海故事等的情节,在这类文本中都消失不见了。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枣强移民传说还可以被称为“传说”吗?

[责任编辑 刘 晨]

Fragmented Discourses: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Excavation of Astronomical Knowledge in the Pre-Qin Era

JING Changhai

Pre-Qin astronomical knowledge can be divided into folk astronomical knowledge oriented towards sacredness and time indication, and official knowledge oriented towards science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Qin and the Han periods, the promo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ccurate astronomical calendars and the twenty-four solar terms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practical use of Pre-Qin folk astronomical knowledge, which gradually became fragmented and lost. Many records of such knowledge in Pre-Qin literature were buried in "literature" due to misinterpretations by later scholars. The upper ninth line of the hexagram "Kui" in the *I Ching* can be interpreted through astronomical knowledge. It actually depicts a star map from the mid-spring season, featuring the constellation of the pig (封豕), the ghost chariot (鬼车), and the arc star (弧星), which are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timing and rhythms of the wedding ceremonies at that time. Understand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order of the lives of the Pre-Qin people is fundamental to the study of Pre-Qi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nd this order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astronomical knowledge of the people. Recovering the astronomical records scattered in the Pre-Qin texts and exploring and revealing the Pre-Qin astronomical knowledg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and foundational task for Pre-Qin humanities research.

Key words: astronomical knowledg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I Ching*; astrology, social rhythm

Faith, Conception and Memory: The Triple Dimensions of the Bird Images in the Han Tomb of Jiyang Sanguan Temple

LV Wenming, LI Hongsen

As a common genre, bird imagery frequently appears in various artifacts and tomb paintings. In the Han tomb paintings in Jiyang Sanguan Temple, Shandong Province, a large number of bird images with diverse forms have been discover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se bird images in different spaces of the tomb chamber reveals functions and symbols of various layers. By integrating the overall spatial layout and image narrati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bird imagery and the ideological world of the Han Dynasty society can be explored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beliefs about life and death, concepts of tomb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emory.

Key words: bird images; narratives; belief; *junshe* (君舍); memory

Research on the Sources of Character Schemas in the Miao Illustrations of the Qing Dynasty: On the Limit Problem of "Proving Customs with Images"

MENG Jinxian

The "Barbarians" and "Agriculture and Sericulture" sec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s daily-used encyclopedias are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character illustrations in the Miao and Liao drawings recorded in the *Guizhou General Gazetteer* compiled by Cao Shengji, as well as the Miao and Liao drawings and Miao drawing manuscripts in *Guizhou General Gazetteer* compiled by Wei Jiqi. The Miao and Liao drawings, the *Red Miao Returning to the Mainstream Map*, the *Qing Dynasty Tribute Map*, the Miao drawing manuscripts all have a borrow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systematic *Farming and Weaving Pictures*, as well as the illustrations in the Ming Dynasty's daily-used encyclopedias, which reflect the drawing methods of ancient Chinese ethnic maps and the underlying representation concepts. The study of the sources of the character illustrations in the Miao drawings demonstrates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mal analysis and reveals the non-documentary nature of folk images, which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folkloric image materials in folklore studies. Image folklore stud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ontology of images, and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using images to study folklore through solving issues inherent in images themselves, and thus promote the study of folk images to a new stage.

Key words: Miao drawings; pictorial borrowing; representation concept; proving customs with images

Why Zaoqiang: On the Ming Dynasty Military Garrisons, Shandong Clan Construction and Zaoqiang Migration Legends

ZHAO Shiyu

The "Zaoqiang migration legend," which claims the ancestral migrated from Zaoqiang, is a popular migration legend in various places in Shandong Province. Previous studies have offered diverse explanations for the migration history behind this legend. According to ex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migration from Zaoqiang to Shandong occurred intermittently from the Jin-Yuan period through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to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of th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connection with Ming Dynasty military garrisons (weisuo), the military rotation system for defense, and the capital operation system, as well as social unrest in the Zaoqiang area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widespread presence of this legend in tomb inscriptions, stele records, and even genealogies is largely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dong clans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That the time of migration from Zaoqiang is generally set in 1369 or 1404 in the Qing Dynasty documents and oral traditions, is using the important events of the early Ming northern expedition and the "Rebellion of Jingnan" as a backdrop to provide a unified ancestral origin marker for clan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Zaoqiang migration legend; Ming military garrisons; Shandong clan construction